



XIFANGZIYOU MINZHU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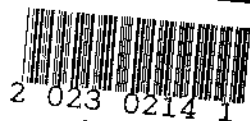


西方自由 民主研究

柳文超 李培湘主编
重 庆 出 版 社

XIFANGZIYOU MINZHU YANJIU

XIFANG
ZIYOU
MINZHU
YANJIU



西方自由
民主研究

主编 柳文超 李培湘

编写

柳文超 李培湘 李国安
谭辉旭 潘佳铭 周庆行
聂应德 周建军 冯开煦

重庆出版社

四川省“七五”期间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责任编辑 张小红
封面设计 彭 广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柳文超 李培湘 主编
西方自由民主研究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 2 字数272千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

ISBN 7-5366-1116-1/D·35

定价: 3.50元

序 言

由西南师范大学柳文超教授和南充师范学院李培湘副教授主编的《西方自由民主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了。编著者邀我为书写一序言。无论从年龄、资历、学术水平各方面看，我还不具备为书作序的条件。但经反复相邀，一再推辞，就有点却之不恭了。故此，不避貶笑大方之嫌，只好勉强为之。

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建设的一大课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目标。因此，从多方面开展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一大任务。

从历史看，我国缺乏民主传统。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和活动程序的民主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充分体现。考察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国几千年来，缺乏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

民主制就其内容来说，是与自由、平等、法制紧密联系的。而这些，又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可以说，民主政治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然而，我国历史上，却是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

几千年来，我国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主要生产方式。在以

6274163

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形式下，自给自足、互不往来、闭关自守、自我满足，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小农尽管也有共同利益和愿望，但由于他们自身缺乏凝聚力而不能自己实现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这种情况，就形成了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明君、清官思想。同时，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法血缘关系在维系人们关系上也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这种以小农为主体，外靠明君、清官行政力量，内靠宗法血缘关系维系，构成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特点。这也决定了我国历史上只有专制没有民主，只有人治没有法制和家长制、官僚主义长期存在的基本情况。如果提到“民主”一词，其内容也是“与民作主”，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始终处于从属的、依附的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进行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了前提。4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应看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原因，封建的、小农的观念并未得到批判和剔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大，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建设已被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提了出来，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办法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在我国当前社会所处的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还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随着全民族文化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才可能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也才会逐步显露出来。

与我国不同，在西方，早在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就已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些地区和国家，如古代希腊的雅典等城市国家，古代罗马，西欧封建社会中的某些城市共和国，都曾出现过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不同性质、程度和形式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就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要求是民主制。

西方资产阶级从其争夺政权时起，便提出了各种民主理论和建立民主制的政治原则。同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建立了适合于其国情的民主政治的体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起，至今，其民主政治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无论在民主思想上，或在民主制度，建立原则以至其民主活动程序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都已比较完善。因此，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一种国家的形式、民主程序来说，都有必要和可能借鉴西方民主制中某些合理的经验。

当然，既谓借鉴，绝不是照搬。因为第一，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是两

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这种本质的界限是必须划清楚的。有些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原则，就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另外，民主政治总是受一国具体国情，即一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条件制约的，民主政治从来就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模式。因而，我们即使从某些具体制度或活动程序上借鉴西方国家的某些经验，同样也不能照搬，而要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这里，还应联系提到对待我国传统的问题。如前所述，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从没有民主的传统，从没建立过民主制度。许多封建、小农观念和专制制度的积淀还需用大力量清除，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无是处，无可继承。我认为，如果我们认真地而不是从偏见出发，在批判其封建性的基础上，是能挖掘出很多有益的精华的。如果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逐步地把我国传统中的有益精华与民主政治的原则结合起来，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会有所裨益，能更好地生根、结果的。

关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问题，我们既要从本质上划清界限，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予以吸收，应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多年来，在我国政治领域中，对前者我们做了不少，而后者却还有待于开发。从目前需要来看，二者都还有待于深入研讨。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准确地划清界限，也只有实事求是，也才能切实开发出有益因素。

既然如此，摆在我们政治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任务，

就是深入细致地了解、分析、研究西方，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从这些分析、研究中找到我们对何者要剔除，何者可吸取。更进一步则应研究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给以吸取，予以结合。这个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读了柳文超教授和李培湘副教授主持编著的《西方自由民主研究》，深深感到他们正是在从事这项有益的工作。读了该书可清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和发展，也可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内容。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既不是简单地“批倒”，也不是简单地介绍。特别是，他们不是孤立地介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问题，而是落脚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既有比较，又有借鉴，而且还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要开拓，就要探索；要探索，就要大胆。当然，开拓、探索都要科学。科学的探索，开始时可能是模糊的，不周全的，但只要勇往直前，必定会登上高峰。

祝贺编著者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能结出累累硕果！

徐大同
一九八八·五

绪 论

西方自由民主是整个人类自由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必然遇到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①只有研究西方自由民主，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它的合理成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实现埋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

本书所言的西方，主要是指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世界。这里是近代自由民主的发祥地。在世界历史上，这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率先掀起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创立了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建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西方自由民主从理论到实践，从形成到发展，迄今已有四五百个年头。它在反对封建专制、推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现在，这种民主理论和政治制度仍然较为有效地调节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关系，平衡着资产阶级内部的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44页。

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所汲取和仿效，遍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有世界影响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制度。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理论和制度尽管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但是，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和统治工具这一本质特征和职能却始终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们，鼓吹他们的民主制度是为全民、全人类服务的，是最公正、最完美的制度，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应义不容辞地予以揭露和批判。

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它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在政治上，它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阶段。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很多，民主和法制的传统很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虽然也有民主之说，但其含义却与真正的民主精神相悖。

“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古籍中早已出现。它的传统意义是：“民之主”、“为民作主”。子民都盼望“好君主”、好“清官”为民作主。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思想和它宣扬的清官观念，所体现的精神是“人治”、“官本位制”；它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它与科学的民主精神是水火不容的。

这种“民主”观念，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是建国以来的家长制现象的直接思想来源，它为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回顾“十年动乱”的岁月，神州大地完全沉浸在一场恶

梦之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接管。一个有5000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竟是一片荒唐和混乱。奇怪的是，在内战和混乱的另一面，举国上下又是那样的一体同心，步调一致，都为 一个“忠”字行动、战斗、呐喊；到处都在“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蓄谋已久的几个野心家、阴谋家，便借助于人们这种愚忠的感情，左右政局，主宰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把专制政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年动乱”过去了，但它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足够几代人认真思考的许多问题。经过这场劫难的人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反思和对比：这场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在西方能够搞得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①

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在西方不可能发生，就在于西方有民主传统，有法制观念，有按照一定的政治形式和法律程序管理国家大事的原则。虽然这种民主的传统、观念、程序、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在这样的国度里谁要想破坏法制发动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是难于想象的。而“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中国几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国的老百姓不懂得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习惯于听一个人的声音，盲目服从，一哄而起，这正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的封建专制的传统，不仅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还直接阻碍着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都是与封建主义相联系的，“多少都带上封建主义色彩。”其中特别是“家长制”现象，它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看成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要求下级“无原则服从‘尽忠’”。“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①

人们常说，“不应割断历史”。今天，我们在反思历史时，也应对“不应割断历史”作一反思。如果把“不应割断历史”，仅仅理解为不应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只从尧舜禹汤那里找民主，而对西方民主不分精华和糟粕一概拒之门外，那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因缺乏正确的比较借鉴而走弯路。我们说，不应割断历史，不仅指不应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还应理解为不割断整个人类的历史。列宁说：“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全部悠久的历史。”②科学是开放的，民主是开放的，开放的主体和开放的社会是发展科学，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我们必

①参阅：《邓小平文选》第287—291页。

②《列宁全集》第4卷，第170页。

须放眼世界，从世界各国吸收我们可以吸收的进步因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但是，西方自由民主，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西方列强曾经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文化征服的历史事实，我们是不可忘记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及其鼓吹的一些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民主观和各种腐朽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和危害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研究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腐朽错误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批判，揭露其危害和实质，以便肃清流毒。

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否定和扬弃，是人类自由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形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都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加之政策指导上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走了不少弯路。痛苦的历史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其优越性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情况使得有的人感到困惑，有的人动摇了信念，有的甚至成为西方的俘虏，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说明，开展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研究和批判是一件有现实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一工作，使人们、特别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更多地了解西方，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的作者们投入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本书把自由与民主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进行探讨，

命书名为《西方自由民主研究》。自由和民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由的实质在于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自由的人，从根本上说，是指这个人能够自主、自立、自决。而民主的实质则在于它的制约性和程序性。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各种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形式来约束政府，管理国家，使之按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行，不能为所欲为，从而使政治体现出它的民意性、公开性和科学性；同时，人民群众也用宪法和各种法律规范约束自己，以保持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否则，就会出现极端民主。

自由和民主不仅在本质上不同，而且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就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而言，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无论从个人，从人类来说，自由都是目的。人类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人类的最高目的，才能进入她的“自由王国”，人才能成为完全自由的人。民主是保障自由的手段，它既保障现代社会的人的自由不受侵犯，又保障作为长远目的的自由的实现。

由于自由与民主在本质和作用上的不同，西方学者曾经认为两者是一对“二律背反”。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既相反又相成，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民主政治，自由便失去保障，在专制政治下，人民无自由可言。相反，人民没有自由权利，就不能发挥多数人制约政府的威力，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自由和民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自由问题和民主问题混为一谈，把两者等同起来。他们在论及民主时，不是着眼于制约，而是着眼于权利，即民主权利。这里所说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就是自由，因为，

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不是别的，就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他们在论及自由时，又偏偏强调多数少数关系。事实上，人们很多自由权利是与多数人的意志无关的，如科学上的自由探讨就是如此。对自由与民主的混淆，既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它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想障碍。有鉴于此，本书在对自由与民主的探讨中，无论是历史的考察，还是现实的论证，都注重两者内在关系的探微，而不是简单地将自由包括在民主之中。

本书分为三编，每一编又分为若干章。

第一编：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研究。在这一编里，我们把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探讨。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产生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主要介绍了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他们怎样把自由民主作为人类解放的理想。德国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这一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想有着某种共同之处，故把康德、黑格尔的自由民主思想也放在这一部分一同介绍。

17、18世纪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时期，也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主要介绍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是怎样形成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怎样为政治革命提供理论旗帜和行动纲领的。

19世纪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建设时期，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主要介绍了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怎样为西方资产阶级提供建国治国的方略；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理论论证。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分化，大改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面临重重困境。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主要介绍了西方学者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各种争论和自由民主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里，各种自由民主新论纷纷出笼，呈现出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局面。

第二编：西方民主制度研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原则和理论指导；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又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得到检验，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两者在发展中，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在这一编中，我们既考察了西方多样性的民主模式，又分析了变化中的民主共和制的内在结构；既从总体上考察和评价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和委员制的基本特征，又从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剖析和考察了它们各自的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总体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力求从纵横两个方面去揭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的规律。

第三编：西方自由民主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这是本书的落脚点，也是本书写作目的之体现。我们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研究西方自由民主的，为此，我们从思想的比较，制度的分析，方法途径的探索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进行考察，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既不能照搬西方，又必须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批判了“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和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把自由民主分为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两个部分来研究，然后再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力求从理论上再现西方自由民主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它的特点和规律。目前，研究自由民主的书，一般都未作这种区分和联系，而把理论和制度融为一体，笼统地加以探讨。我们认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总是离不开它的理论作指导；理论总是产生于制度之前；而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又会推动它的理论发展。自由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正是在这种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我们对西方自由民主从理论和制度上加以区分和联系，更能真实地反映西方自由民主发展的历史概貌和内在逻辑。

第二，我们在考察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时，又把自由和民主加以区分，将自由放在与民主相同的地位加以探讨，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已在前面作破题说明时作了阐发，这里不再赘述。目前，我国出版的这方面的书大多把自由包含于民主之中加以探讨，这是不无道理的。但仅把自由作为民主的一个内容去探讨是不够的。因为自由既是民主的前提，又是民主的目的；既是民主建设的起点，又是民主建设的终点。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共产主义是人类的自由王国的实现。

第三，近年来，各门学科都普遍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本书也将其作为研究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在两种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比较过程中，并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比长论短，也没有停留在它们产生的基础不同，性质不同等一般论证中，而是在阐明它们各自的阶级本质、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既寻求借鉴，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